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金毓黻与 《中国史学史》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雍学术经典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金毓黻与 《中国史学史》

胡正宁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毓黻与《中国史学史》/ 金毓黻著; 胡正宁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5

(南雍学术经典)

ISBN 978-7-305-07646-6

I. ①金… II. ①金… ②胡… III. ①史学史—研究

—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66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南雍学术经典

书 名 金毓黻与《中国史学史》

著 者 金毓黻

编 者 胡正宁

责任编辑 莫永明 施 敏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5 字数 347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646-6

定 价 5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洪银兴

学术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在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世纪回眸”中，我们在重估和评价百年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就中国现代人文科学而言，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留下前辈学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他们的独辟蹊径汇成了我们的康庄大道。

众所周知，南京大学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百年高校之一。她有两个历史源头，一个是肇始于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创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历史上各朝唯一的国家高等学府如太学、国子监等皆可称为“辟雍”，而明代曾于北京和南京各设一所国子监，号称“北雍”和“南雍”。因此，作为清政府创办于南京的新式学堂，三江师范在当时也就承膺了“南雍”的美誉。1914 年以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时期，1949 年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定名为南京大学。另一个是 1888 年（光绪十四年）成立的基督教会汇文书院，后来发展为金陵大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全国院系调整中与南京大学合并，构成了现在的南京大学。这样的经历不仅显示出她的悠久，还显示出她的坎坷——不断地更名，不断地重组、合并、调整。其实这正是中华民族近现代颠沛历史的缩影。而南京大学历经沧桑，卓然屹立，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传统，涌现出众多的名师大家，给我们留下丰硕的学术遗产，其中必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这大概就是南京大学的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其中“诚”字最为根本，也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早的校训。“诚”是真实而不虚妄的真理，也是追求真理、诚信

不欺的美德。

南京大学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是南京大学精神的典型体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民族文化的重建过程,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充满了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科学、玄学的争论,“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是当时中国大学总体性的人文精神,而历史上的南京大学又提出过具有自我取向的“昌明国故,融化新知”、“人文与科学平衡”等学术主张和办学宗旨,可见南京大学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态度,走的是温故知新、继承创新的学术路径。她的两个历史源头已经显示出这样的学术趋向:一是建立在中国教育传统上的“新学”,但提倡国学、艺术与科学三者兼通融合;一是具有西学东渐背景的教会大学,却对中国文化重视有加,成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较早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这样的源头活水,不断地吸纳志同道合的名师大家,汇成源远流长、独立不迁的学术传统。

今天,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时代,南京大学迈向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进程,我们饮水思源,愈加感到受益于这些名师大家们赋予我们的学术财富和精神力量,愈加渴望对他们蕴育的传统加以系统的研究总结,返本开新,发扬光大。

“南雍学术经典”丛书是南京大学历史上学术大师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精选。它吸收中国传统学术史中“学案”的编纂形式,邀请大师们的学术传人或研究专家,精选荟粹大师们的学术代表作,对其生平、学术加以述评并制作学术年表,再按不同的学科陆续分辑出版。这样一项研究性的出版工程,不仅勾勒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脉络,而且在新的视角下展示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精华,其中不乏首次被整理、公布的珍贵资料。同时,为了进一步展示20世纪南京大学的学术面貌和学术贡献,我们以后还将陆续推出其他学术大家的经典著述。我们相信,这套书系的出版不仅是南京大学学术传统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且也为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份极富价值的学术文献。

2008年3月28日



金毓黻先生(1887—1962)

目 录

导读(胡正宁).....	1
一 金毓黻先生生平事迹.....	1
二 《中国史学史》述评	13
中国史学史	25
金毓黻先生学术年表.....	388
主要参考文献.....	391

导 读

胡正宁

一 金毓黻先生生平事迹

金毓黻，原名毓玺，一名玉甫，字谨庵，后改静庵，别号千华山民，室号静晤，今辽宁省灯塔县八家子村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1887年7月19日），卒于1962年8月3日，享年76岁，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北文献史学家，史学泰斗，一代宗师。在其从事史学研究的40余年时间里，共著述1200余万字，平均一天撰写近千字，为中国史学界一座丰碑，罕有其匹。

金毓黻自幼家境清贫，但学习刻苦，聪慧过人。其父金德元为一位乡间塾师，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耳濡目染，使得年幼的金毓黻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常常手不释卷，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金毓黻6岁即入乡塾读书，16岁时，因家境所困，一度辍学从商；但在工作之余，仍念念不忘博览群书。1906年，20岁的金毓黻在欣赏其才华的启化小学校长白永贞的帮助下，考入辽阳县启化高等小学堂免费就读。1908年，考入奉天省立中学堂，1912年中学毕业。1913年，金毓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堂文学门，受教于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桐城派古文学家黄侃门下。大学期间，金毓黻曾听过朱希祖的课《中国文学史》，由于志趣相投，其后他

与朱希祖亦师亦友,在文献搜求、史料考订方面有非常多的交流。金毓黻后来在撰写《中国史学史》时曾致书朱希祖,盛赞其史学成就,说:“近见吾师所著《濮族考》,可谓名世之文,前人未经道过。尝谓吾师之史学,可在国内自树一帜,发前人所未发者甚多。……近撰《史学史》,引用师说甚多,即缘此故。”由于金毓黻师承黄侃,而朱希祖与黄侃都是章太炎的弟子,所以无论是因为他求学于北大,还是就师承关系而言,金毓黻在史学史的研究上均可划入朱氏之系谱。

1916年夏,金毓黻从北大毕业后,返回东北。在奉天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员,其后又在奉天文学专门学校任教,期间一直致力于史学研究。

1920年3月6日,金毓黻开始写《静晤室日记》,毛边纸,朱丝栏,字体均用行草,文言:“举凡四十年之生活经历、时事政治、读书笔记、治学心得、文物搜集、考古游记、遗闻轶事、诗文唱和等皆载入其中,作日记读可,作全集读亦可。”静晤室的含义,金毓黻解释说:“静晤者,期以静中有所晤也”,“吾人惟守动中求静,静中求乐”。又说:“人能于至动之中,以求至静,然后能以静制动,而不为外诱所夺。”盖欲摒绝外诱,潜心治学也。《静晤室日记》一直延续到1960年4月23日,历40年零2个月,卷帙浩繁,共约500余万字,后装订成17函,共170册,分169卷。日记中关于东北近代史事的记述,如《东北军始末简记》、《张作霖别传》、《杨宇霆别传》、《郭松龄别传》、《王永江别传》、《王树翰别传》,内有许多史料鲜为人知,也不见于其他记载,极大地丰富了东北史地研究的史料,相当珍贵。《静晤室日记》与清赵翼《廿二史札记》、顾炎武《日知录》系同类书,为史学者所必备。

金毓黻曾在1920年7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人求学,当以研究真理为帜志,验之时势,或有乖违,亦不足为真理之障,何也?盖研究真理,如剥笋,如抽蕉,愈剥愈深,愈抽愈细,其所趋途径甚速,每立于指导社会地位,故辄与时势乖违也。譬之数学,高至微分、积分,多与实用相远,然学之者,不因其鲜实用而不习也。研究真理,亦与此同。理果属真,则必万古不废,与现世或有凿枘,然终有实现之一日。否则离去事实,乖违时

势,何得谓之真理?更何有研究之价值?此至明之理,无假深言者也。”“余谓今日学者之揭橥,或曰唯是,或曰唯真,或曰唯新,主张似异,其实徒同。何以言之?求真理者必明是非,是即是真,即二即一,不可分也。然新之为用,即含真理,亦明是非。离乎真理是非,以言唯新,则新无所附丽,亦即无以自立。是新者即真即是,三者亦一也。真理愈明,是非愈定,而新愈有用矣。”由此可见,伴随西方近代学术的输入和传播,金毓黻不仅对西方学术“求真”的主旨体会更为深刻,同时已然将“求真”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追求目标,这种意识或者说态度,贯彻在他的整个史学研究生涯中。

1921年春,金毓黻出任吉林永衡官银钱号总文书,不到半年时间,又改任吉林省交涉署第一科长兼秘书。1922年7月,金毓黻出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兼长春开埠局副局长,次年出任吉林省财政厅总务科长。自1922年起,怀着一颗爱国忧乡之心,金毓黻即致力于乡邦舆地故实之学,开始了对东北史志文献的研究。他认为地方志是中国非常珍贵的地方文化遗产,因此他相当重视地方志的修撰和研究。他更大力提倡全国普修地方志,在继承旧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充实劳动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内容。金毓黻在后来编撰的《东北通史》引言中这样说:“不佞世居辽东,基于忧乡之心,研究东北文献,积有数年。”在其后将近半个世纪中,他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文献,在阐述方志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

1925年,再度出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不久的金毓黻转任长春商埠电灯厂厂长。当时正是长春城市发展、商业繁荣的时期,金毓黻锐意改革,整顿经营,大力启用新的经营理念及生产技术,使电灯厂的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观。1928年,电灯厂全年盈利184368元,商埠地电灯数量达到两万盏,是电灯厂自建成以来经营形势最好的一年。与此同时,金毓黻还主持编纂了《长春电灯厂营业志》。

从1922年至1928年,金毓黻受聘《长春县志》总编纂,亲自撰写了天度、疆域、城镇等大量志稿,为长春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长春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29年3月,金毓黻出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秘书,着手撰写《东三省丛编》。次年3月,改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

1930年4月22日,金毓黻在沈阳大东边门外穹窿顶砖室右室的石棺中,发现了辽瓷青釉黑花瓶。本着“求真”的精神,金毓黻进行了严格细密的考察,从石棺前刻有“辽开泰七年岁次戊午承德郎守贵德州观察使判官大理司直赐绯鱼袋孙允中”的铭文(开泰七年为公元1018年,辽圣宗年号,属辽中期),到青釉黑花瓶瓶高25.2厘米,肩部和下体绘有野菊,器面三个六角形中,绘有高士、立鹤、伏兔,草丛之间,一兔惊顾的形体特征(野菊与野兔,均为契丹人游牧草原上习见的景观,亦为辽瓷的写实画面),推定它是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的辽瓷。关于这件辽瓷的历史价值,越瓷之父陈万里先生在《辽代陶瓷》序中说:“沈阳孙允中墓中所发现的开泰七年青釉黑花瓶,腹部绘有高士、立鹤、伏兔三个画面,充分表现了当时的风格,由此可见到了辽瓷的一个庐山真面目。”言中满是对金毓黻发现辽瓷的肯定和称颂。由于金毓黻最早向学术界发表了关于辽瓷的推论,因此后人尊称他为辽瓷之父,其犀利的鉴赏目光,广博而准确的观察力,严谨细致的考学态度,均为后人所称道。

1931年3月,沈阳东北大学废副校长制,设大学委员会,金毓黻与张伯苓等人受聘为沈阳东北大学大学委员会委员,5月,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结识调任辽宁省教育厅第二科第一股股长,兼任第四科第二股股长的金景芳,两人结成莫逆之交。金毓黻在日记中自述:“余本书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与政治关系甚浅,而外人不之知也。且吾国数千年之惯,学优则仕,仕优则学,学问政治无明确之界画,故学问之士非投身政界无以谋生。实以此为谋生之具,非以其有兴味而为之也。”在此期间,他利用从政的便利条件,组织“东北学社”,创办了“东北丛镌”,并主持编纂了《奉天通志》。

“九一八”事变后,金毓黻不幸被日寇逮捕。即使在遭人软禁之际,金毓黻仍不忘其学术钻研,《渤海国志长编》的编撰就一直没有中断,“全书共二十卷,四十余万字,体例略仿旧制:曰纪、曰表、曰传、曰考。引书一百

三十余种,渤海史料搜罗殆尽。条理整饰,釐然有序,考辨弥精,立论充当,是不可多得资料论著,至今仍为研究渤海国史所必备之参考著作”。

在被关押了3个多月后,金毓黻被时任奉天省长的臧式毅保释,被迫出任伪满奉天公署参事官,同年冬天改任伪满奉天图书馆副馆长。次年5月,金毓黻介绍金景芳到沈阳第二初级中学任国文教员。其时因战事愈演愈烈,民众人心惶惧,不少私人收藏的图书流散街头,价格也都很便宜,两人遂选购了大批图书,潜心钻研,收获颇多。

1933年10月,金毓黻出任伪日满文化协会理事兼协会《满洲学报》主编,次年秋天,任伪奉天通志馆总纂,兼东北大学史地系教授。

1936年,金毓黻离开沈阳沦陷区,以考察文物的名义访问日本。在日本逗留的3个月时间内,金毓黻主要在东京活动,他考察了日本的一些学术研究机构 and 藏书馆,也和一些日本学者进行了学术方面的交流。7月12日,金毓黻化名搭乘加拿大“皇后”号,从神户出发直达上海。他的《神户至上海航行中作》诗云:“鹤鸣破清空,天高一何迥。鱼龙汨出没,沧波森万顷。仰视星斗繁,云开知夜永。予身适万里,茫茫若漂梗。家山念已破,寸心常耿耿。露坐到天明,同舟人未醒。”抒发了家山破、人飘零的感慨。

在上海登陆后,金毓黻首先拜访了黄炎培和蔡元培,又经过蔡元培的引见,赴南京见到了傅斯年,并由傅斯年引荐给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和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以及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段锡朋。几人言谈甚欢,对金毓黻的学识均表示赞赏,并当即邀请他到中央大学任教。金毓黻自谦,“诸公所以如此优礼者,以余千辛万苦由伪(满洲)国逃出,藉此微职以为安慰也”。然而在段锡朋看来,金毓黻实在是“东北读书种子”,所以他嘱咐罗家伦一定要“善视之”。金毓黻后在《静晤室日记》中作诗云:“同室何分越与秦,感君高谊独沾巾。读书种子原非我,钜眼英雄大有人。论事快如瓶泻水,举头亲见海扬尘。明朝握手沧江上,应许衔杯慰苦辛。”诗中洋溢着对段锡朋、傅斯年的感激之情。

不久,金毓黻即受聘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教育部特约编辑、中央

大学教授。金毓黻在《静晤室日记》中写到：9月2日，“将任中央大学史学讲席，自今日编辑讲义稿”，9月11日“始授中央大学东北史”，这表明他开始编写东北史讲义，为中央大学历史系学生讲授东北史。与此同时，金毓黻还应苏州章氏国学会邀请，讲授目录学。

1937年4月，即将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的刘尚清邀请金毓黻出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金毓黻遂向罗家伦请假，于5月5日乘“江安”轮离开南京沿江而上，金景芳也随之迁往安庆，出任安徽省政府秘书处秘书。两人到达安庆后，金毓黻就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他在中央大学的第一次执教生涯也就随之告一段落。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借口为了统一协调对日作战，强令安徽省政府改组，金毓黻愤然辞职，后溯江而上，于1938年1月4日到达重庆。此时，由于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中央大学已经从南京迁移到重庆。1月7日，金毓黻访问了朱希祖、胡小石、沈刚伯等人，“略谈及中大课程”，获知“大约每周九点，上课缓至二月亦可”。3月14日，金毓黻出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开始为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讲授东北民族史和中国史学史，并担任了文学系应用文的授课任务。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学校为下期开课之第一日，余任课三种：一为中国史学史；二东北民族史，此属于史学系；三应用文，属于文学系者。”

同年2月，金毓黻开始着手《中国史学史》的编撰，到11月26日初稿完成，包含导言、第一章古代史官概述、第二章古代史家与史籍、第三章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第五章汉以后之史官制度、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第八章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第九章清代史家之成就、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他的《中国史学史》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全书“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詮次，以为诵说之资”，将梁启超提出的“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四个方面作为基础架构，具体而完整地实践了梁启超的史学史编纂思想，论述方面则以刘知几、章学诚所论史学的见解为准绳。此外，该书一重史料

考证,二重材料排比,在推动中国史学史这门专史的发展上起到了草创之功、发挥了积极作用。

8月,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臧启芳致函,邀请金毓黻到三台的东北大学执教。东北大学是20世纪前期奉系军阀张作霖主掌东北时创办的一所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成为第一所流亡大学,1938年4月在四川的三台停留下来。“九一八”事变前,金毓黻曾担任过东北大学大学委员会委员。接到臧启芳的邀请函后,金毓黻思量再三,以“方草《史学史》未就,且拟续撰《东北史》,需参考书甚伙,一经移转,则旧业立废,未忍舍此就彼”的理由“作书谢之”。11月,金毓黻开始为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授宋辽金史。

1939年9月,金毓黻曾将《中国史学史》初稿托友人携往香港,期望能在香港出版,然因国难当头,战火纷飞,未能如期出版。与此同时,臧启芳再次邀请金毓黻到东北大学授课,言辞恳切,金毓黻于是向中央大学请假半年,到三台的东北大学为史地系学生讲授东北史。期间,为了不致影响中大史学系学生的学业,金毓黻在授课之余,始终抽出时间保持着与中大史学系学生的书信往来,“前后得中央大学左、张、李、周四君函,于论文题旨及读史方法有所询问。一一为之答复”。

同年,金毓黻的《宋辽金史》整理后出版,该书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宋辽金断代史的研究著作,书中金毓黻主张以宋朝为正统,寄托了他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民族之情。

1940年2月,在三台东北大学任课一学期结束后,金毓黻又回到中央大学继续讲授宋辽金史。同年8月23日,为了筹备“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金毓黻不辞辛劳再赴三台,亲自草拟了章程及工作标准大纲。当时的东北大学经费困难,物资缺乏,但在金毓黻的苦心安排下,研究室在短时间内便初具规模。研究室建立后,金毓黻任主任,引领学生们在钻研历史的同时亦关注现实,成果颇丰。

其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改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给予硕士学位。东大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发端。研究室改为文

科研究所后,金毓黻仍任主任之职兼东北大学史学教授。

8月27日,考虑到两地奔波耗费大量时间,且当时已年过半百,身体难于负荷,金毓黻决定向中央大学请辞,并寄函详述求去之意。10月28日,金毓黻回到中央大学,与文学学院院长楼光来与教务长郭量宇商谈请辞之事,“午前至中央大学,晤楼、郭二君,谈史学系事略有眉目。余力主将系主任职务辞去,专任教授,请假一年,而楼君不允,只好俟至明日与罗志希(即罗家伦)校长面商”。

由于罗家伦的竭力挽留,金毓黻的请辞未获批准。他在中央大学处理了一些系务之后,于11月29日又回到三台东北大学,继续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两地交替授课。

1941年,民族危机的加剧,促使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东北的历史。日本政府与军部以及财阀合谋,大肆叫嚣“经营”(实际上是侵略)满洲,必须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上,对我国东北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民俗等加以勘探,并发表了一批诸如矢野仁一《满洲发达史》,南满铁道会社调查报告《满洲历史地理》和《朝鲜历史地理》,筱田治策《白头山定界碑》等歪曲史实的文章,妄图吞并东北。不仅是为了“与外人争胜”,亟欲振兴中国学术,更为了正确展示历史进程,澄清历史事实真相,唤起大众的爱国热忱,激励大众收复故土,金毓黻积极地投入到了“整理国故运动”中。

带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情感,金毓黻将旧稿重新整理后,又补撰两章,纂为一书,是为《东北通史》上编,计39章,40万字。他在《东北通史》的引言中说:“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是也。姑无论其用意若何,所述有无牵强附会,而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试检其国谈东洋史之专著,十册之中,必有一册属于东北,论东方学术之杂志,十篇之中,必有一篇属于东北,总其部居,校其篇目,林林总总,几于更仆难数。世界各国学者,凡欲研究东洋史、东方学术,或进而研究吾国东北史,必取日本之著作作为基本材料,断然无疑。以乙国人,叙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重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世界学者读之,应作如何感想。

是其影响之巨，貽患之深，岂待今日而后见。此由吾国向无此类精详之专书，可供世界学者之考览，而国人忽略史事，研究不早，亦其一端也。譬之居家，室中之藏，土田之籍，牛马蕃息之数，戚党隆杀之等，主人概不之知。而其邻人或素昧平生之士，登其庭入其室，开其篋箧，一一而探索之，分类而晰载之，细大不捐，如数家珍，吾知其家之败可立待，且将挈其所藏以人于他人也。今日之情，何以异是。为主人者，亟应自计其室中之藏，土田之籍，马牛蕃息之数，戚党隆杀之等，失之东隅，犹可收之桑榆。然则研究东北史，其可缓乎。”

关于“东北”一词，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一书中解释说：“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居于中国之东北部，国人为称说之便，合而称为东北，允矣。四省之地，为中国之一部，东北一词，亦即中国东北部之简称，其义至明，无待详说。”此外，他又信心十足地说：“试展兹编，前事具在，文献之足征，比于田产之质剂区画界至明白可数，是则蹊田而夺之牛者，终当返故物于旧主，余惟濡笔以俟之耳。”

在《东北通史》的编撰过程中，金毓黻不仅精心搜集东北史料，同时也非常注意实地对史迹的考察。他在编印东北通史缘起中说：“余治东北史地文献之学，垂二十年，于文字记载外兼及金石明器图像，凡足迹所能至，不惮跋涉山川狎犯霜露以赴之。”作为一名对史料与史迹并重的史学家，金毓黻为考察中国东北古代历史文化遗址，走遍了东北的穷乡僻壤，并曾自己出资组织考古发掘工作。他曾经考察过渤海上京龙泉府，辽中京大定府，而金上京会宁府、辑安高句丽丸都山城、北镇医巫闾山东丹王陵、新宾县兴京老城、义县北魏万佛堂、赤峰灵峰院千佛洞、承德避暑山庄、辽阳清耿仲明怀王寺、海城尚可喜墓等地，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与身影。从《静晤室日记》中显示，金毓黻曾想去考察辽上京临潢府，然而因为路途艰险，以至于未能成行。

1941年7月4日，史地教育委员会(1940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金毓黻和顾颉刚、缪凤林、黎东方一起提出了《由本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案》，获得了大会通过，决定

将史地教育委员会作为筹备中国史学会的通讯处,并由该会酌助经费,并发函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

8月,身在三台东北大学授课的金毓黻以“年逾五十,精力渐衰,讵能久主系务,多耗精神……”,“潼川地僻无酬酢及警报之扰,可以安心读书,且能撰稿,渝地不然……”,“以往两年奔走长途,已以为苦,且战期觅车不易.途中复多险峨……”等理由再次提出辞去中央大学所任职务。他致函罗家伦“托向顾新校长(时顾孟余为中大校长)将中大史学系主任辞去,以便专任东大研究室事”。由于顾孟余不同意他辞职,“坚约回渝”,金毓黻又分别给顾孟余、楼光来和时任教务长的童冠贤去信,“细思此事症结,惟在担任系务,旷日不归,则于学校各方必致多所贻误,且不免来人之责难,惟有迅将系务辞去,别由能者继之。则一切不致贻误,此又下走一再请辞之理由也”。

经过反复协商,金毓黻辞去了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一职,仍担任中大教授职位,时年54岁的他,仍在奔波两地交替授课。一直到次年7月,深感体力难以为继的金毓黻再次提请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务,正式办理了离职手续,专执教于东北大学,兼任文科研究所主任和文学学院院长职务。同年,征得116位专家同意,史地教育委员会决定另案呈请准予定期召开成立大会,拟与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时举行。

1943年3月24日,在金毓黻与李济、傅斯年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大会召开,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也在中央图书馆举行,顾颉刚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大会通过了《中国史学会会章》,选举了理事21人,候补理事9人,监事7人,候补监事3人,并于3月26日召开了中国史学会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至此,中国出现了形式上统一的中国史学会,金毓黻堪称功不可没。同年秋天,金毓黻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授。

1944年,几经周折,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这本考辨扎实、内容丰富的著作,被教育部指定为大学教本,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在《导言》中,金毓黻自述撰写时参